

哲学研究

和合中华哲学思潮的探析

张立文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 北京 100871)

摘要: 哲学思潮是某一时代社会所共有的思想现象,它影响人的思维方法、行为方式、价值观念。哲学是以思想的思想而反思的思想,从这个意义上说,哲学可理解为动词。它是寻求真知的智动。标志中华哲学创新的三原则:核心话题的转向、诠释文本的转换、人文语境的转移。中华哲学的哲学规定:中华哲学是指人对宇宙、社会、人生之道的道的体贴和名字体系。一个民族的母语,是这个民族哲学智能创造的源头活水,一个民族的语言能力和思辨精神,源于其民族的生活活动实践之中。在世界全球化的当代,人类共同面临着人与自然、社会、人际、心灵、文明五大冲突,并带来生态、社会、道德、精神、价值五大危机,需要和合学的和生、和处、和立、和达、和爱五大原则来化解。和合学的核心话题是和合,有别于先秦元创期的道德之意、两汉奠基期的天人相应、魏晋发展期的有无之辨、隋唐深化期的性情之源、宋元明清造极期的理气心性的核心话题。

关键词: 哲学思潮;核心话题;诠释文本;和合学

中图分类号: B 2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919(2014)02-0011-12

“天接云涛连晓雾,星河欲转千帆舞。”在晨雾茫茫之中,看那云涛翻腾、与天相接、滚滚银河、千帆竞渡的壮丽景象,反思中国哲学思潮发展历程,她像变化神妙的云涛,她像繁星璀璨的银河,她像千帆竞舞的龙舟,以达中国哲学仙境般的和合境界。

一、哲学与哲学思潮

中华民族哲学思潮,从古至今,潮涨,波涛汹涌,璀璨多姿,一潮高过一潮,一潮胜过一潮;潮退,平静如镜,寂然反思,沉然吐纳,感而遂通。大凡思而成潮,都有其所以然的因缘,梁启超说:“其思必有相当之价值,而又适合于其时代之要求者也。”^①不是说每个时代都有哲学思潮,有哲学思潮的时代,是中华文化发展的时代。贺麟说:“一个思潮的发生原因,有两方面:一方面是思想本身的发展演变,一方面是解决实际问题的需要。

思想本身的发展演变恰如潮水之后浪推前浪,新思潮的发生是解决思想本身所发生的问题,因为旧思想有偏颇缺陷,新思潮乃得起而代之。新思潮是旧思潮所孕育激励起来的,同时也是旧思潮的反动与否定。至于社会上有迫切问题待解决时,其为新思潮的刺激,更是很明显的事,这时思潮是主动的,为应付环境而产生的,这也可以说是产生思想的外在原因,而上面思潮引起思潮则可称为产生思潮的内在原因。”^②哲学思潮是某一时代社会所共有的思想现象,它影响人的思维方法、行为方式、价值观念,宇宙体贴、人生伦理、知识体认等。在哲学思潮的潮流中,都有其代言人,这便是当时时代的哲学家。

哲学之所以思而成潮,是有其引力的缘故。这个引力就是被自然、社会、人生的冲突和危机所凸显出来的热点话题,吸引大众来参与思议、论争、交流,以求在化解冲突、危机中,达到殊途而同

收稿日期:2013-12-20

作者简介:张立文,男,浙江温州人,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孔子研究院院长。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中国哲学思潮发展史”(05AZX003)的阶段性成果。

①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重庆:商务印书馆1943年版,第1页。

② 贺麟:《当代中国哲学》,南京:胜利出版社1947年版,第68页。

归,百虑而一致,并提升为体现时代精神的、化解冲突的同归、一致的理念。这个理念便是时代的哲学核心话题。在经济全球化、科技一体化、网络普及化、地球村落化的当代,人与社会、自然、人际、心灵、文明之间的冲突和危机,已度越了单一民族、国家和地域,而成为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便需要有人类共同化解的理念,和平、合作便成为世界的核心话题。中华民族哲学思潮,自先秦元创期以“道德之意”为核心话题,标志其时代精神精华的哲学思潮;演变转生为两汉奠基期的以“天人相应”为核心话题,标志其时代精神精华的哲学思潮;又演变转生为魏晋发展期的以“有无之辨”为核心话题,标志其时代精神精华的哲学思潮;再演变转生为隋唐深化期的以“性情之原”为核心话题,标志其时代精神精华的哲学思潮;又再演变转生为“造极”期的以“理气心性”为核心话题,标志其时代精神精华的哲学思潮,并一直延续到现代。

中国哲学思潮,潮起潮落,一波接着一波,大化流行,永不停息。作为标志时代精神精华的哲学核心话题随“话题故事”不息转生,演变发展。罗蒂认为,应把哲学理解为一种在不同历史时期之间与在文化之间、科学之间互相联系的诠释行为。其实作为哲学的哲学,其本身也在唯变所适地流变着、反思着。从这个意义上说,哲学可理解为动词,它不是静态的物体及精神生成物的总和,也不是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固有成果的总和,而是为反思着的思想者所拥有。反思的思想,不是静若止水的思想,静若止水的思想是思想僵化的思想;反思的思想,是会思想的思想,既会顺向的思,亦会逆向的思,这是一个会思的动态的过程。反思是人殊胜地把思想反过来而思,这反过来而思就是追根究底地思,是以思想的思想而思,这个以思想的思想而反思的思想,就是哲学的本真。基于此,和合学哲学曾这样为自己定位:“哲学是爱智之学,它的本质在于寻求真知,是真知之爱。因此,哲学总意味着‘在途中’,和合学亦是

‘在途中’,它是一种生生不息之途”!^①这可以说,哲学可诠释为一个动词,它是寻求真知的智动,是为人类精神而思的神动,是以思想的思想而反思的思动。哲学是一种流变着的、形而上的艺术。

哲学诠释为动词,因其本身也在不息地变动、演化之中,不同的时代呈现其不同的理论思维形态、标志其不同时代的时代精神精华的哲学核心话题,依傍其符合时代“话题故事”的诠释文本,适应其唯变所适的不同时代的需要。真乃是“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②,不可为典要。虽然哲学的爱智之道常存,但是哲学寻求真知话题却永无完结,和合生生道体也是讲不完的话题。

哲学本身是“为道也屡迁”的,是人拥有哲学,而非哲学拥有人,是人智能创造哲学,从而让哲学造就人之向善而生的生存至高之境,而非哲学创造人。然而,哲学一旦成为“哲人王”,人也就被异化了;哲学一旦成为绝对真理,成为放之四海皆准的理性规定,人就成为哲学的奴婢,若有不同的观点,就被扣上“异端邪说”“离经叛道”的罪名;哲学一旦成为统治的意识形态,便成为戴震所说的“理能杀人”的工具,明代的李贽如是,清代的“文字狱”如是,多少人的人头落地!其实柏拉图所提倡的是“哲人王”而非“哲学王”,指的是只有不倦追求善、美、真知的哲人最具备反思精神,所以与“真知”距离最近,然而最近也并未抵达真知,仍然只是“爱智者”的哲人。哲人正因为“爱智”“反思”能力超越众生,所以应该为王,引领全社会都能反思。那就意味着真理不在人的手中,绝对标准只存在于永恒的探索之中,这也是我理解哲学应为动词的缘由之所在。

哲学应守住其爱智的本真,操守其为人类精神的反思的本质,洁身自好。

正由于哲学本身是“变动不居”的、“虚位”的,所以留下无限的解释空间。何谓哲学?见仁见智,纷纭齐陈。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中开

① 张立文:《和合学概论——21世纪文化战略的构想》,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20页。另《和合学——21世纪文化战略的构想》,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98页。

② 《系辞传下》,《周易正义》卷8,《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89页。

章明义:“哲学的定义,从来没有一定的,我如今也暂下一个定义:凡研究人生切要的问题,从根本上着想,要寻一个根本的解决,这种学问叫作哲学。”^①冯友兰也说:“哲学一名词在西洋有甚久的历史,各哲学家对于哲学所下之定义亦各不相同。”^②哲学之谓哲学的定义,“从来没有一定”,各哲学家所下的定义“各不相同”。既如此,各哲学家依据自己对动态哲学的体认,而对哲学作出规定:方东美以哲学为情与理两者;唐君毅以哲学为哲学,就是要了解各种学问之相互关系,及其与人的关系,“哲学是智之学,或如何完成智德,如何成为哲人之学”^③;罗光认为,人生之道即是哲学,哲学是人之整个精神活动的表现。可谓一千个人,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这种对哲学之为哲学的规定,体现了哲学的动态性、多样性、非定性、殊胜性、生生性。换言之,没有唯一的哲学,没有“祖宗之法不可变”的哲学,没有僵死的哲学。哲学是活的哲学,是有生命的哲学。各个世界文明古国、各个民族、各文化圈,都有其追求真知的反思的思想,都有其体现其民族精神特色的时代精华的哲学思维。这就是说,各民族、各文化圈的哲学对于其本身都具有其精神的有效性、诠释的合理性、证实的合法性。

哲学的为道屡迁性、变动不居性,开出了中国哲学的新生面、新学风、新格局,转生了中国哲学的新理论、新观念、新方法。这都是一次哲学生命智慧的自觉和哲学智能创造的创新。在当前中国社会大改革、大开放、大转型之际,国际社会大变革、大调整、大激荡之时,在这种情境下,如何澄明地梳理、把握、调控其间错综复杂、千丝万缕的种种形色的冲突,睿智地擢升、抽象出化解这些全球性、普遍性冲突的价值理念,是我们所应思索的。那种执着教条式地照搬照抄以往的理论思维、价值理念,显然已不适合;跟风式地热买热卖西方的所谓普遍哲学、普遍范式,与中国水土不合。唯一

出路,就是中国哲学必须自己讲自己的哲学,自己必须实现自己哲学的智能创生或价值理念创新,即建构创新理论体系,创新学术观点和创新方法论,而不能照猫画虎式地“照着讲”,或者东施效颦式地接着西方哲学讲。

二、标志中国哲学创新的三规则

中国哲学怎样智能创生或价值理念创新?从中国哲学思潮的先秦百家之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儒释道三家之学、宋元明清理学的演变发展中,探赜索隐其怎样实现智能创生或价值理念创新;钩深致远其为什么、何以可能实现其智能创生或价值理念创新;格知求索其如何实践理论体系创新、哲学观点创新和方法创新。经笔者长期的中国哲学教学研究,殚精竭虑地体贴、明确了中国哲学每一次转生和创新的特征、性质、内因、外缘,把握了中国哲学理论思维形态转生和创新的内在“游戏规则”,即逻辑必然之则,以及对中国精神反思的哲学范畴概念全面系统的梳理和体认,曾体贴出中国哲学转生的何以可能、为什么、怎样实现智能创生或价值理念创新,即理论体系创新、哲学观点创新和方法创新,我们至少可以发现这样三条“游戏规则”^④,或曰中国哲学创新的标志。

一是核心话题的转向。思想是时代精神的言说机制,哲学作为以思想的思想而反思的思想,亦是人类精神思想的反思。精神不能离思想而存在,精神总是思想着精神,思想是确定作为精神的那种东西。大凡作为时代精神的妙凝的哲学思想,总是以核心话题的方式体现其特定时代的意义追寻和价值创造。每一时期哲学的转生和创新,都围绕着对核心话题的反复论辩,化解时代所面临错综复杂的冲突危机,梳理盘根错节的生命情结,建构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而成哲学思潮,反映时代主流思议话题。核心话题的时代转向,

① 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上海:商务印书馆1919年版,“导言”第1页。

②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版,“绪论”第1页。

③ 唐君毅:《哲学概论》上册,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页。

④ 此三条中国哲学创新的标志的详细分析见拙作:《中国哲学的创新与和合学的使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

是哲学创新、价值理念创生的话语标志。

二是诠释文本的转换。文本是哲学思想言说的符号踪迹,是智慧觉解的文字报告,是主体精神度越自我的信息桥梁。每个时代的哲学家必须凭借对一定文本的探赜、研究、体贴和诠释,以提炼体现时代精神的核心话题,使其全面融入民族精神及其生命智慧。每个时代所面临的冲突和危机有异,其化解冲突危机的价值理念的核心话题亦不同,其所依傍的诠释文本也差分。每个时代诠释文本的转换,说到底是在世结构的选择,是理论思维转生、意义追寻和价值追求的投射,是中国哲学创新的继承性的昭示和哲学学派创立的文献标志。

三是人文语境的转移。中国哲学是中华民族热爱生命、追求智慧的心路历程。因此,中国哲学的创新在宏观演替上,就表现为人文语境随民族精神及其生命智慧的历史变迁而不断转移。人文语境是指一定时代的自然生态、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典章制度、伦理道德、价值观念、理论思维、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生存世界、意义世界、可能世界的思议环境。人文语境犹如历史星空,岁月悠悠,旋转不息,漫漫漂移。

“此三条中国哲学理论思维形态创新的‘游戏规则’,是逻辑地蕴涵在每一次哲学理论思维形态转生之中的,是存在于中国哲学的创新标志之中的。”^①它具有有效性与普适性。这就是说,要实现中国哲学的创新,要实现中国哲学思维逻辑形态的转生,最低限度应遵循此三条“游戏规则”,否则很难说是中国哲学的创新和中国哲学思维逻辑形态的转生。这是因为这三条“游戏规则”是中国哲学理论思维形态创新和转生本真的彰显,具有中国哲学历史的实在性、本质性、客观性。

作为度量中国哲学理论思维形态创新和转生标准的三条“游戏规则”的发现,不仅深化和提升了人们对中国哲学理论思维内在逻辑演化转生规律的体认程度和调控水平,而且钩深和致远了人们对中国哲学思潮未来理势的预设能力和管理效能。它使中国哲学理论思维演变历史的分期断代

间何以可能创新转生、为什么、怎样创新转生,以及创什么新、转什么生都有了彰显和标准,也使中国哲学理论思维有可能度越“照着讲”“接着讲”“对着讲”,而为中国哲学“自己讲”“讲自己”,营造了鸢飞鱼跃的空间。大凡中国哲学每个时代的创新和转生,都存在着理论思维上内涵意蕴、价值理念、哲学思想、方式方法、结构规律等继承性、参照性的诉求,因此,中国哲学理论思维形态的创新和转生,既有对传统哲学理论思维包括对“照着讲”“接着讲”“对着讲”成果的吸收,又有系统性、整体性的度越。

中国哲学理论思维形态每个时代的创新和转生,都是冲决以往既定的、固化的哲学理论思维逻辑体系、价值理念、思维方法的网罗的结果,都是一次度越“照着讲”“接着讲”“对着讲”,而“自己讲”“讲自己”的硕果。每一次中国哲学理论思维形态创新和转生的“自己讲”“讲自己”,都是一次中国哲学的自己解放自己,都是一次中国哲学的哲学觉醒。

近现代以降,与“自己讲”“讲自己”相对应的是“照着讲”“接着讲”,其“照着讲”“接着讲”所讲的内涵和对象有所扩充,它不仅照着、接着中国传统哲学理论思维形态讲,而且照着、接着西方哲学之谓哲学的内涵、范式、方法讲。因此,中国哲学的“自己讲”“讲自己”,不仅是对中国传统哲学的继承和度越,也是对照着、接着西方哲学之谓哲学讲的吸纳和度越。“自己讲”“讲自己”就是中国哲学排除干扰和执着,卓然独立、自作主宰地“自己讲”。“自己讲”是中国哲学主体毅然挺立于世界哲学之林。这个中国哲学主体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主体,是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地蕴涵了中西古今传统人类精神反思的哲学思维的主体,它是中国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精华妙凝和合的主体。“自己讲”的中国哲学主体本身历经先秦、两汉、魏晋、隋唐、宋元明清以至现代哲学创新和转生的实践检验,中国哲学“自己讲”是一条“而今迈步从头越”的康庄大道,是通向和合生生道体之境的形上之道。

^① 参见拙著:《和合学——21 世界文化战略的构想》,第 8 页。

“讲自己”就是中国哲学自己讲自己的哲学所谓哲学,而不以西方哲学之谓哲学;中国哲学家以自己的哲学为哲学家,而不以“西洋所谓哲学家名之者”为哲学家。“讲自己”就是中国哲学自己讲述自己对时代精神核心话题的体贴,讲述中国哲学自己对“语题本身”的重新发现,讲述中国哲学自己对每个时代所面临错综复杂的冲突的艺术化解,讲述中国哲学自己对每个时代所发生的危机的义理调节,讲述中国哲学自己对安身立命、价值理想和精神家园的至诚追求。“讲自己”不仅设计了“自己讲”的性质、内容和价值指向,而且“讲自己”澄明了主体域哲学理论思维形态创新和转生职责,这是对古希腊苏格拉底哲学“认识你自己”使命的逻辑延伸^①。

“自己讲”“讲自己”是中国哲学理论思维形态转生和创新的三条“游戏规则”的前提和基础。“自己讲”“讲自己”把中国哲学自我从内外各种执着中解脱出来,使其耸立于人文精神世界,必须对以往围绕着人文价值时间、全球生存空间和精神活动逻辑而展开旷日持久的论辩,加以清理。要通过解构“古今之变”,疏明人文价值时间,转生传统,将往古、现今、未来和合成一条不断度越的思议升华之路;通过解构“中西之争”,疏明生存空间的和合特征,使“和也者,天下之达道”,得以流行;通过解构“象理之辩”,澄明人文精神和合结构,使和合生生道体大化流行、生生不息。此三大解构的精神宗旨,就在于为中国哲学在新的生存空间、价值时间和逻辑本源情境下,为中国哲学创造“自己讲”“讲自己”的机遇。如果说:“古今之争”从秦始皇咸阳宫古今之争始而一直延续至近现代^②，“象理之辩”自魏晋追求玄冥之理，得象忘言、得意忘象的逻辑开演，那么，中西之争为近现代西方器物文化、制度文化、价值文化潮水般涌入，而推向高潮。疏明、体认此三者，可以从另一侧面领悟中国哲学理论思维形态创新转生的

必然性、必要性及其指向性，也为中国哲学“自己讲”“讲自己”开拓广阔的活动天地。

三、中国哲学的哲学规定

中国哲学“自己讲”“讲自己”，而不照着或接着西方哲学之谓哲学讲，必须深入中国哲学之垒，探赜追究中国哲学内在逻辑演化之道、内在转生的因缘理路；钩深寻觅中国哲学理论思维形态创新体系、价值理念、思维方法的昔、今、来的整体行程；格知追寻中国哲学理论思维形态转生创新每一时代的内在逻辑“游戏规则”。在尽究体认、领悟中国哲学之后，也可像胡适所讲的那样，“我如今也暂”为中国哲学下“一个定义”：“中国哲学是指人对宇宙、社会、人生之道的道的体贴和名字体系。”

所谓人对宇宙、社会、人生之道的道的体贴，是指人应体贴入微地细心忖度宇宙、社会、人生的境遇、生态、秩序、安危、心灵、文明、健康状态，而给予无微不至的关切、照顾。在这里，“体贴”一词受程颢“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的启迪，从而建构了以天理为核心思想的理学哲学理论思维体系，所以“体贴”有体悟、反省、反思的意思。这里所体贴的“道的道”：一是指人对宇宙、社会、人生的体贴、反省、反思、体会其导向、倾向、指向某一方向的道路；二是指宇宙、社会、人生的根本性质和道理；三是指不可言说的、无形无象的宇宙、社会、人生所以然的形上根据；四是指宇宙、社会、人生所当然、所必然的理势；五是指其大化流行、唯变所适的创新、转生的过程轨迹；六是指其知与行及其逻辑结构的方法论；七是指格致、诚正、修齐、治平的道理、规范及其价值理想和精神家园；等方面。

“道的道的体贴”的“名字体系”，“名”是中国古代哲学理论思维中名家的核心范畴，是“名

① 德尔斐神庙中传神谕的女祭司庇西亚(Pythia)告诉苏格拉底朋友海洛丰说：苏格拉底是人中间最智慧的人。苏氏推论“自知自己无知”正是他聪明的所在。“人们啊，像苏格拉底这样认识到自己的智慧真正说来是没有什么价值的人，才是最有智慧的。”（苗力田主编：《古希腊哲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08页）

② 参见拙著：《传统学七讲》，长春：长春出版社2008年版，“修订版自序”第3—9页。

实之辨”的“名”，“名”为自命，为天地万物命名，是思维的自由创造，主张“名实”相符。先秦“礼崩乐坏”，名实不符，所以孔子主张“正名”，以使名实不二。“名”是指模拟事物实相的称谓，是人对于体知对象的性质、内涵的判断词，相当于现代所说的概念、范畴。“字”，汉许慎编撰《说文解字》，是一部分分析字形、解释字义的书。《隋书·经籍志》载，晋李彤撰《字指》^①，解释文字的含义。北宋王安石撰《字说》，亦为解释字的形、音、义的书，统称为“字书”。南宋陈淳撰《北溪字义》（又称《字义详讲》《四书性理字义》），疏释、论述程朱理体学（道体学）^②概念、范畴，是对性、命、心、情、太极、道、理、意等 26 个概念、范畴的意义的诠释。“学者诚能熟绎其义，溯流寻源，由本达支……皆总括于是书矣。”^③清戴震撰《孟子字义疏证》精选、诠释了理、天道、性、才、道、仁、义、礼、智、诚、权的哲学概念、范畴的意义。

如果说，《说文解字》《字指》《字说》是据“六书”解释单个字的意义的话，那么，《北溪字义》《孟子字义疏证》就是解释概念、范畴意义的书。“名字体系”是指由哲学概念、范畴的意义的诠释而构成的理论思维逻辑体系。

中国哲学只有依据中国哲学自己实践的实际，即根据中国哲学的本真，自己给自己下哲学定义，才能真正实现中国哲学“自己讲”“讲自己”，才能从西方哲学之谓哲学的注脚和以中国哲学论证西方哲学普适性中冲决出来，才能在世界哲学

之林中获得自己独立的、应有的地位、价值和话语权。

中国哲学自己给自己的哲学下定义，中国哲学理论思维形态创新和转生的三条“游戏规则”，开显了中国哲学“自己讲”“讲自己”的新格局、新学风、新思维、新观念。这里的所谓讲，既不是“自己照着西人讲”，也不是“自己接着古人讲”。讲的话语应是“华语华说”“以华解华”，而不是“华语胡说”，也不是“华语西说”。话语权的丧失，就是其文化载体的文化精神的丧失，也是其深层的哲学灵魂的丧失。话语权标志使用这种语言的民族文化之根、民族精神之魂，标志这个民族的民族硬实力和文化软实力的融突和合为和实力，标志这个民族发展水平和文明程度，标志这个民族理论思辨的能力和语言逻辑的工夫。因此，“自己讲”“讲自己”，应该“教给哲学说华语”，这是对黑格尔“教给哲学说德语”这句名言的代换。黑格尔说：“如果哲学一旦学会了说德语，那么那些平庸的思想就永远也难于在语言上貌似深奥了。”^④将这句话中德语换成华语，那么西方那些“平庸”的思想就永远也难于在语言上貌似强大、权威和深奥了。

一个民族只有用自己民族的语言来体知那最优秀的东西，才能消化为自己的东西。当代的中华民族哲学家，只有让哲学说华语，哲学才能在中华大地腾飞。黑格尔之所以说哲学一旦学会了说

① 《经籍志》，《隋书》卷 32，北京：中华书局 1973 年版，第 943 页。

② 程朱理体学又称道体学是基于程颐称其兄程颢的学说为“道”学。他说：“自予兄弟倡明道学，世方惊疑”（《祭李端伯文》，《二程集》第 643 页）。道学仅指程氏兄弟及其门人的学说。南宋淳熙年间（1174—1189）程颐的四传弟子朱熹等大倡道学，林栗、陈贾等反道学，论争颇烈。道学者遭到攻击。据朱熹所编的《伊洛渊源录》来看，编入的道学者仅有周敦颐、程颢、程颐、邵雍、张载、张戢和其弟子门人。而不包括司马光涑学、荆公新学、陈亮叶适事功之学、陆九渊心学、吕祖谦的婺学。元代脱脱在修《宋史》时，特立《道学传》，入传的人基本上与《伊洛渊源录》同，唯增朱熹的师传和弟子及张栻。把陆九渊、陈亮、叶适、吕祖谦等列入《儒林传》，加以分别。因此，本书将程朱一系称为“道体学”。同时，程颢讲：“吾学虽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河南程氏外书》卷 12，《二程集》第 424 页）。从而开启了理学哲学理论思维形态的建构，朱熹集程氏理学之大成，因为程朱以理（道、太极）作为其哲学的最高范畴，所以亦称程朱为“理体学”，它只是宋明理学中的一派。宋明理学中还包括“心即理”的陆九渊、王守仁等以心为哲学理论思维最高范畴的“心体学”派，及王廷相、王夫之等以气为哲学理论思维最高范畴的“气体学”派等，所以理学所包括的范围比道学要广。详见拙著：《宋明理学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5—14 页；修订本，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6—12 页。

③ 胡荣：《北溪字义·序》，北京：中华书局 1983 年版，第 89 页。

④ 苗力田译：《黑格尔通讯百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262 页。

德语,那些平庸思想就难于在语言上貌似深奥了,是因为哲学作为古希腊人爱智觉醒,是他们用“自己的语言”的智能创造,中世纪基督教哲学家,用拉丁语讲哲学。^①黑格尔认为,作为失去了生活源头活水的拉丁语,其对于表达新思想已成为僵死的话语,只有运用自己民族规范化语言,才能表达哲学思辨精神,他说:“我们必须承认德国语言富有思辨精神,它超出了单纯理智的非此即彼的抽象方式。”^②他以德语有丰富的逻辑词汇,以及富有思辨精神,而华语同样具有丰富的逻辑词汇和思辨精神,亦是其他民族语言所不可比拟的。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一个民族的语言能力和思辨精神,源于其民族的生活活动的实践之中。一个民族的母语,是这个民族哲学智能创造的源头活水,是一个民族哲学思维的前提条件,是民族哲学创新转生的坚实土壤。伽达默尔说:“一般说来,语言能力只有在自己的母语中才能达到。这就是说,我们是用母语的眼光学会看世界,反过来则可以说,我们语言能力的第一次扩展是在观看周围世界的时候,才开始得到表现的。”^③用母语的思辨精神进行逻辑理论思维,哲学思辨的表达,是最睿智、最有效的选择。美籍华人傅伟勋曾说:他晚年必须回到母语上来思议哲学,也只有母语是最好的哲学语言,是表达哲学思想的最好语言,除此之外,别无他途。他呼吁回到母语!^④中国哲学“自己讲”“讲自己”的前提、土壤、基础、源头,就是华语(或称汉语)。而不应以西语说华语、说华哲,若如此,正如黑格尔所说:“它还将是野蛮的。”^⑤

中国哲学创新和转生,是中国哲学“自己讲”“讲自己”的必然诉求和目标,是检验三条“游戏规则”是否真正实现的标尺,是审议中国哲学自己定义自己实践的标准。中国哲学思潮发展的每

一时期的历史经验表明,实现中国哲学的创新和转生,必须“自己讲”“讲自己”,必须遵循“游戏规则”,必须对中国哲学性质有深切的体贴。否则就不能对中国哲学有真正意义上的创新和转生。

四、实现中国哲学转生的和合学

中国哲学与时偕行,唯变所适,是中国哲学创新转生的必然性诉求,也是社会发展的迫切性要求。当前在现代新儒学的新理体学、新心体学、新气体学接着宋明理学讲、讲了近千年的情境下,已是“山重水复疑无路”。那么能不能、要不要开出“柳暗花明又一村”,便严峻地摆在中国哲学的面前。现代新儒家是在中华民族灾难深重、亡国亡族的遭遇下,挺立中华民族文化精神,接着宋明理学讲,有其合理性的特殊价值和意义。如果说现代新儒家的哲学思议的对象,主要着眼于自己民族、国家的话,那么,在当代世界经济全球化、科技一体化、网络快速化、地球村落化的境遇下,哲学家、思想家、政治家、经济学家、文化家、谋略家、军事家等所思议的对象,已与现代新儒家所思议的对象,大相径庭。他们必须具有全球的视野、人类的意识,来思议人类所共同面临的错综复杂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的心灵、文明之间的冲突,来反思人类精神的孤独焦虑、痛苦忧愁、迷惘空虚,以及幸福愉悦、终极关切、精神家园等融突话题。因此,当今的思想家、哲学家等不仅要思议化解自己国家民族的冲突和危机,而且要思议化解人类所共同面临的冲突和危机。这是时代所赋予的使命和职责。

这个时代赋予的使命和职责的主旨,是实现中国哲学理论思维形态的创新和转生。为此,必须度越现代新儒家的接着宋明理学讲,必须解构清理中国哲学从近现代遗留下来的、现代新儒家

① 参见邓晓芒:《让哲学说汉语——从康德三大批判的翻译说起》,《社会科学战线》2004年第2期。

② 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213页。

③ 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下卷,洪汉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版,第633页。

④ 1994年4月8日,笔者与傅伟勋教授共同参加由冈田武彦教授主持的“东亚传统文化国际会议”期间,他准备辞掉美国天普大学终身教授教职,回台湾佛光大学任教,我问他为什么,他说了上述的话。1995年9月,笔者受台湾“中研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筹备处邀请讲学,我与傅教授同住国际学术会馆,他又谈及母语问题。

⑤ 苗力田译:《黑格尔通讯百封》。

所应对的中西、古今、象理三大思辨,以疏明人文精神世界的生存空间、文明时间与逻辑本原,必须解构度越西方“求一法”在形而上追究中的执着,培养非零和交往的自主性、生生性,这是时代赋予当代哲学的使命。因此,当代哲学理论思维形态的创新和转生,不仅仅是纯粹的某个国家民族的哲学学派或个人,某种传统哲学思维创新和转生,其一切哲学的创新和转生都具有人类哲学创新转生的价值。这是新的人文语境对新哲学形态所提出的新诉求。

如何不负时代赋予的使命和职责?如何实践中国哲学理论思维形态的创新和转生?如何像程颢那样在融突儒、释、道三教中,自家体贴出“天理”二字,而成为体现时代精神精华的核心话题,为崭新的理学哲学理论思维逻辑形态的创新和转生奠基。于是笔者从基础做起,从范畴入手,经长期的殚精竭虑,全面系统梳理、诠释了致广大的中国哲学所有的重要概念、范畴,又尽精微地思议、反思、体贴每个哲学概念、范畴在每个哲学家哲学理论思维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其在每个时代哲学思潮中的价值和影响,体知其中哪个哲学概念范畴成为体现时代精神精华的核心话题,成为那个时代哲学论辩的热点主题^①,凡思而成潮,再经思而入微的体认反思,再体认再反思,筛选出中国传统哲学理论思维的几个概念范畴,从中体贴出最能反映时代精神精华的“和合”范畴,作为化解人类所共同面临的人与自然、社会、人际、心灵、文明之间的五大冲突,与由此冲突而造成的生态、社会、道德、精神信仰、价值的五大危机,并以和生、和处、和立、和达、和爱五大原理,作为化解五大冲突和危机之道,建构了和合学哲学理论思维的新形态。

和合学的和合话题,从一开始就深深扎根和滋润在民族精神和生命智慧的“源头活水”里,表

征着中华文化之根、之魂的形上生命,塑造着中华以和为贵的伦理道德,体现了中华人文精神的价值理想,开显了中华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和合学是以和合为核心话题,予和合以形上体贴和当代性人类精神反思形态的和合理论思维建构。“和合”是一个差分性、殊异性,而又融突性、融合性的范畴。

“和”是对于天地万物差分性、冲突性形相、无形相基本价值的承诺和体贴,并在此基本价值承诺、体贴的反复互动、融突基础上,以求各各差分性、冲突性的形相、无形相获得协调性、和谐性、有序性规范,酝酿与支撑着各差分性,冲突性形相、无形相在协调性、和谐性、有序性过程中,开发生生潜能,大化流行。“合”是对于冲突性、差分性、异质性的形相、无形相,经反复互动、融突的协调、和谐的“和”,而落实到合的合作、结合、融合的新事物、新生命的和合体上。和合显现的是一幅形相、无形相本身及其内在互相关系的差分、冲突、融合、细缊、生生、创新、和谐画卷的全过程美景。

和合学的和合在各层次、各方面期盼着所营造真善美和合氛围的此在感受,这种心灵精神的感受,不仅是中国人,而且是全球人的期盼,从而有了和合(和平、合作)、和谐世界的诉求,成为化解当前人类所共同面临的五大冲突和危机有效能的选择。和合既是中国传统精神的内核,也是当前中国能够引领世界精神的文明价值的体现,同时更是当代世界所欠缺的精神大要,所以它既是当前中国哲学理论思维的核心话题,也应该是当代世界哲学思维的话题之一。

体现当前时代精神的精华所建构的和合学的和合核心的话题,标志着中国哲学理论思维逻辑形态的创新和转生。自从宋明理学哲学理论思维

^① 在此期间对中国哲学范畴、概念的体认、梳理,出版了《朱熹思想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宋明理学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中国哲学范畴发展史·天道篇》(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中国哲学逻辑结构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传统学引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新人学导论》(北京:职工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以及《中国哲学范畴发展史·人道篇》(1992年完稿,1995年8月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20世纪80年代末,笔者提出了《和合学的建构》,载《中国近代新学的展开——新儒学哲学与新儒家的超越》,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1年版,第296—304页。

逻辑形态创新转生之后,近现代的儒家和新儒家,虽致力于在向西方学习“真理”过程中,积极会通中西,以现代价值理念,装饰儒学,但由于时代的局限、救亡的迫切,未能尽精微地探赜体认作为中国哲学理念思维创新转生标志的“游戏规则”,而未能把中国哲学理论思维的创新和转生落到实处。虽然亦提出了一些运思的设想,然终究未能建构出度越宋明理学哲学理论思维逻辑形态的新哲学形态来,实现哲学理论思维逻辑形态的转生。

西方思维与哲学的核心基础是“同”的逻辑,拒绝“和”的立场,追求同质性,反对异质性共存,所谓“文明的冲突”,就是这种思维的结果。为此,中国哲学之核心精神和合学之所以度越宋明理学哲学理论思维形态,并以此彰显中国精神之精华,从而在西方语境入侵之后重新获得属于中国哲学的话语权,就是在于对人类所共同面临的冲突和危机的深切体认,对时代精神的理智把握,对体现时代精神精华的核心话题的合理凝练,对化解当代冲突和危机的切实了解,以及对哲学理论思维形态创新转生“游戏规则”的历史性发现和遵循,而建构了标志中国的哲学理论思维逻辑形态的和合学,开出了中国的哲学理论思维形态的创新和转生的格局,实现了以和合核心话题度越先秦“道德之意”、两汉“天人相应”、魏晋“有无之辩”、隋唐“性情之原”、宋元明清“理气心性”的艰苦竭虑的历程,从而开显了中国和合哲学理论思维逻辑形态的创新和转生。这是对中国哲学何以能创新转生,以及创什么新、转什么生的回应。

五、《国语》诠释文本的选择

随着人文语境的转移和核心话题的转向,作为体现时代人文语境和核心话题依以诠释的经典文本,也随之转换。这是因为每个时期哲学思潮代表人物通过对一定经典文本的诠释,借以阐释自己哲学对宇宙、社会、人生的道的道的体贴,凭以建构自己哲学理论思维的逻辑“名字”体系。

和合学所依傍的诠释文本主要是《国语》,辅

以《管子》《墨子》。《国语·郑语》记载:史伯与郑桓公答问王室“兴衰之故”和“死生之道”,及如何成就“天地之功”时,史伯说:“虞幕能听协风,以成物乐生者也。夏禹能单平水土,以品处庶类者也。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周弃能播殖百谷蔬,以衣食民人者也。”^①虞思能“听知和风,因时顺气,以成育万物,使之乐生”。夏禹熟悉水性,“使万物高下,各得其所”,因地疏导。商契能和合五教,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百姓和睦,皆得保养。后稷播种百谷,培育蔬菜,使人民丰衣足食。他们成就了天地之功,其主要原因就在于他们能在天地与人事之间创造和合生意。然而周幽王反其道而行,抹杀天地与人事间的生意,去和而取同,必将衰败,这是因为“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②。如何“和实生物”,乃是多元差分性质的元素在“以他平他”的和的情境下杂合而成万物。揭开了多元和合生生不息的帷幕,即将演出一场光彩夺目、生意斑斓的剧目。若反其道而行,“以同裨同”,犹以水加水,就不能成就新事物,所以说“同则不继”。

“和实生物”是古人对于天地万物从哪里来的追问的回应。中华古人仰观天文,俯察地理,理智的求真,就会思议这样一个哲学问题。史伯之后屈原仍然追问:“遂古之初,谁传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冥昭瞢暗,谁能极之?冯翼惟象,何以识之?”^③往古之初,没有天地,也没有人,谁来传道,怎么考究体认?昼夜未分,氤氲浮动,惟象无形,何以穷极而知道它?可见当时人们对天地万物本原问题的重视和关注,是人的智慧地反思。史伯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的回答,是当时哲学思议的最佳成果。

“和实生物”“以他平他谓之和”的尊重他者的思议,在“和实生物”的金、木、水、火、土多元形相、无形相要素等化醇、细缊、化生万物过程中,各形相、无形相是平等的,无高低、上下、轻重的差

① 《郑语》,《国语集解》卷16,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466页。

② 《郑语》,《国语集解》卷14,第470页。

③ 《天问》,《楚辞集注》卷3,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49页。

别,这才可称它为和。这种“以他平他”尊重他者的“和”,是互相理解、互相诚信、互相吸收、互相融合的和。“和为贵”是中华民族最珍贵的价值,和平、合作的和合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的品性和特征,是当代化解五大冲突和危机的最佳选择,是时代精神的体现。基于此,和合学以《国语》作为其依傍的诠释文本,这就度越先秦的“六经”、两汉的《春秋公羊传》、魏晋的“三玄”(《周易》《老子》《庄子》)、隋唐的佛经和宋明的“四书”(《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等诠释文本的依傍,实现了诠释文本的转换。

和合学以人文语境的转移、和合核心话题的转向、《国语》诠释文本的转换,创新转生为新的理论思维逻辑形态、新的学术观点、新的方法论,从而建构了和合学理论思维体系。

六、中国哲学思潮史的分期

中国哲学思而成潮,潮起潮落,潮潮相推,接续绵延,永无间断。思潮与思想差分:思想,各人有各人的思想;哲学思想,亦各人有各人的哲学思想。“思潮是一社会在某一段时期中所共有的思想,蔚为风气,个人被其影响而不自觉,所以凡称思潮的思想,便成为一个社会现象,能支配各个人的行为。思潮不是少数人的思想,而是社会共有的思想。”^①尽管各人有各人的思想,但是“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②。在同声相应的情境下,殊途同归、百虑一致,思而成潮,蔚为风气。

中国哲学思潮,后浪推前浪,由先秦、两汉、魏晋、隋唐、宋元明清而推向现当代,先秦是中国哲学思潮的原创时期,华夏诸族融合,经夏、商、周三代“制礼作乐”,思想意识日益觉醒,哲学精神渐次突破,达到了“郁郁乎文哉”的文明境域,先秦哲学思潮便在礼乐文化的人文语境的土壤中萌生和创发出来。尽管诸子百家纵横争鸣,旨意不同,但都围绕着“道德之意”,论道讲德,其所以讲道论德,是为化解现实生存世界所面临“礼崩乐坏”的冲突与危机。当时各诸侯国为争夺土地和权利,互相攻伐,战争频繁,杀人盈野,民有饥色,路

有饿殍,所以民心思安,人心祈和,建设和合生存世界,就成为当时民心所向的首要价值。在“五经”中,和是形而上的天的意志,是万物化生的本原,是以他平他的和合。和是民族精神的价值核心,从而开启春秋战国诸子的思想言说和哲学互动,而成哲学思潮,在世界轴心期哲学突破中具有辉煌地位和重要价值。

秦汉之际,中国社会实现了一次深刻的大变革、大转型。秦代以法治国、以吏为师,迅速而亡。汉初为医治战争的破坏,与民休养生息,奉行“黄老之术”,但都未形成哲学思潮的主流。两汉作为中国哲学思潮的奠基期,汉武帝为使刘汉政权长治久安,举贤良文学之士,“垂问天人之应”。当时的贤良博士都围绕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天人相应”核心话题,开展论辩,“天人相应”是人们在思议人之所以生存、如何生存、怎样生存的价值根据时,祈求有一实体性神灵的支撑,于是天就成为人的曾祖父,成为人的终极的价值根据。人心便由建设和合生存世界而转向追求人在和合生存世界中的地位、天人关系中的意义。为此论争,而成哲学思潮,为中国哲学理论思维奠基做出了贡献。

魏晋南北朝为中国哲学思潮的发展期,其时国家长期分裂,政权更替频繁,政治集团间彼此倾轧,生命价值虚无缥缈。人生朝不夕保,尽管一些人以荒诞的行为表现对现实社会的不满和反抗,而在内心深处仍然思议着活着为什么、人活着有无价值、人的命运能否自己掌握、人生价值能否实现,等等话题。人心祈求建设一个和合的意义世界,这就促使学术思想活跃,哲学创新激荡。名士清谈,辨名析理,度越名教而任自然,围绕着“玄冥之理”的“有无话题”,成为“玄远”的哲学时尚谈资。人们热烈地思议、不倦地论辩着无有、本末、自然与名教等话题,激起了人们追求真知的兴趣,探赜那玄而又玄的天地万物的终极本原。这一“清谈”而谈出了玄学哲学思潮,转生了两汉以“天人相应”为核心话题的哲学思潮。

隋唐是中国哲学思潮的深化期,其时民族大

① 贺麟:《当代中国哲学》,第67—68页。

② 《系辞下传》,《周易正义》卷8,《十三经注疏》,第87页。

融合、文化大交流,儒、释、道三教兼容并蓄、冲突融摄。儒学已失独尊气势,道教吸取佛教之长,佛教的般若智慧和涅槃妙道,独占鳌头,朝野上下习佛、皈佛,趋之若鹜,时代精神的凝聚和哲学思潮,体现为佛教的中国化创新,穷究推本“性情之原”。佛主“一切众生悉有佛性”,与中国传统心性论相融合,儒讲性情三品说或性善情恶论,道倡性情自然说。三教围绕“性情之原”话题,既显示各教旨趣的差分,又昭示三教话题的相似。佛教认为,佛性是能否成佛的根据,无论是有情有性,还是无情有性,有情无情皆可成佛;儒教认为天命之谓性,性是善的,情有善有恶,改恶从善,便可超凡成圣;道教修炼自然性情,而羽化登仙。三教各完成其终极人格理想和终极关切,追求一个和合可能世界的精神家园,以获得精神的慰藉。中国哲学思辨不断深化,于是转魏晋“有无之辨”哲学思潮为“性情之原”的哲学思潮。

宋明是中国哲学思潮的“造极”期,或曰高峰期。唐末五代十国,腥风血雨,百花凋敝,纲常失序,道德沦丧,理想失落,价值颠覆,精神迷惘。为化解所面临的严重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道德、精神等冲突和危机,宋代思想家、哲学家毅然担负起“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历史使命,焕然大明中华文化道统,为道德重建、理想重塑、价值重构、安身立命、精神安顿的建设,倾注其生命智慧和智能创造。宋明理学家兼容并蓄儒、释、道三教,在尽究佛道之旨后,返诸儒教“六经”,自家体贴出“天理”二字,建构了以“理气心性”为核心话题的理学哲学理论思维逻辑体系。各家围绕“天理”(简称为理)话题,或以“道即理”,或以“心即理”,或以“气即理”,或以“性即理”,而成“道体学”(或曰理体学)派、心体学派、气体学派、性体学派。虽各派思想倾向有异,但其核心话题相同,其思想价值宗旨,都是为安顿终极关切的精神家园,建设一个和合可能世界。其哲学理论的思辨,达到了中国哲学思潮发展的高峰,并影响朝鲜半岛、日本、越南等国,一度成为其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宋明理学实现了度越隋唐“性情之原”的哲学思潮,而转生为“理气心性”之学的哲学思潮,并趋于高潮。

高潮总要退潮,潮涨潮落,这是自然规则,哲学思潮的演化亦有这种现象。元与清以其草原文明扫荡宋明的农业文明和工商文明,使城镇生机涂炭,农田变牧场,人民变“驱口”,开放变封闭。他们重新拾起程朱理体学,作为科举考试的教本,或以“文字狱”的文化思想的恐怖主义,使舆论一律,哲学创新转生的生命智慧枯萎了、扼杀了,宋明哲学思潮偃旗息鼓。清季民国,中国哲学虽薪火未灭地延续着,但外有列强帝国的侵略,内有社会危机的深重,民族精神备受蹂躏,精神世界无法弥补。虽有戊戌变法,但无力回天。于是有人打点行装,向西方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他们会通中西,标榜“新学”,而实接着宋明理学讲,而成新理体学、新心体学、新气体学等,以至新佛学、新墨学等。由于时代的局限,他们不能体认、把握中国哲学创新转生的标志,其哲学思潮的核心话题,其所依傍的诠释文本,依然沿袭宋明理学,而没有实现创新和转生。

随着西学东渐、西方话语的引入,并改造了中国传统思维与哲学思维,其实践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现在世界迎来了全球化时代,与全球化时代同时出现了人类的各种冲突、危机以及无法化解的各种矛盾,和合学依据当代国内、国际人文语境的大变革、大转型、大发展、大转向,以及时代精神终日乾乾,与时偕行,诉求着体现时代精神精华的核心话题的转生与其所依傍诠释文本的转换,以便与时代精神精华相匹配,实现了度越现代新儒学,转宋元明清理学哲学思潮为和合学。和合学以其生命智慧和智能创新,转变宋元明清的“理气心性”核心话题为“和合”核心话题,转换“四书”诠释文本为《国语》诠释文本,这个转与换,彰显了和合学的生命力,及其“百尺竿头须进步”的不断擢升思而成潮的动力。“在途中”的和合学期盼在大化流行、生生不息中成长壮大,为中华民族哲学屹立于世界哲学之林,为谋人类健康福祉而努力。

中国哲学思潮发展的历程,是一个系统的、有序的、逻辑的演化过程,哲学思潮的核心话题一个紧扣一个,哲学话题的思议一步深入一步。先秦思议“道德之意”话题,其标的是追求一个没有杀人、没有战争的和平、安定、统一的生存世界。两

汉思议“天人相应”话题,其宗旨是追究人之所以生存的根源、根据,回应人为什么生存的天人感应及其相互制约的问题。魏晋思议“有无之辨”话题,其要旨是回应人为什么活着、人活着有没有意义、以什么样式实现人生价值、能否实现人生价值的问题。隋唐思议“性情之原”话题,其目标是追究人生从何来,死到何处的灵魂的安顿、终极的关切问题。宋元明清思议“理气心性”话题,其宗旨是建构人格理想的超凡入圣,社会理想的为万世开太平的安身立命、精神家园问题。当代思议人类共同面临的人与自然、社会、人际、心灵、文明之

间的五大冲突,而带来的生态、社会、道德、精神、价值五大危机的情境下,如何化解此五大冲突和危机,建构一个和生、和处、和立、和达、和爱的和平、合作、幸福、富裕、快乐的和合生存世界、和合意义世界及和合可能世界的问题。

时代的自然、社会、人生的问题、冲突、危机,永远是哲学所思议的核心话题,哲学人的职责就在于“继往圣”,而又度越“往圣”,而妙拟出化解问题、冲突、危机之道。梳理、总结、体认“往圣”所创造的哲学思潮,以激出哲学新思想的火花,焕发哲学理论思维创新的激情。

A Contemplation and Argumentation about Integral Harmony as a Trend of Thought in Chinese Philosophy

Zhang Liwen

(School of Philosophy,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Abstract: The trend of thought in philosophy is a phenomenon of common thinking in an era or in a society, which affects people's ways of thinking, behaviors and values. Philosophical thinking is the thinking as a reflective thinking. In this sense, the word Philosophy can be understood as a verb. And it is an activity of wisdom to seek for truth. There are three principles which mark the innovation of Chinese Philosophy or Chungghwa Philosophy: conversion of core topic, transformation of text interpretation and transition of cultural context. Chinese Philosophy can be defined as considerations and name systems given by human beings about the universe, societies and ways of life. The mother tongue of a nation is the fountainhead of its intelligent creation in philosophy. And the linguistic competence and speculative spirit of a nation are originated from the practice of its living activities. In the contemporary world of globalization, human beings are commonly faced with five conflicts, which are their conflicts with nature, society, other people, their own spirit and culture. And these five conflicts have brought about five crises in eco-system, society, morality, spirit and values, which should be resolved by the five principles coming from the Theory of Integral Harmony. The five principles are harmonious life, harmonious co-existence, harmonious establishment, harmonious achievement and harmonious love. The core topic of the Theory of Integral Harmony is Integral Harmony, which is different from that of Moral Intention in the Pre-Qin Period when it was initiated, that of the Nature-human Correspondence in the Han Dynasty when it was established, that of the Argumentation on Existence or Non-Existence in the Wei Period and the Jin Dynasty when it was developed, that of the Origin of Spirit and Emotion in the Sui and Tang Dynasties when it was deepened, and that of *Li* (理, idea), *Qi* (气, energy), *Xin* (心, mind) and *Xing* (性, personality) in the Song, Yua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when it was in its heyday.

Key words: trend of thought in philosophy, core topic, text interpretation, Theory of Integral Harmony

(责任编辑 刘曙光)